



##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 年 2 月 25 日)

### 1、大西洋理事会发文分析拜登在慕安会强调的历史拐点

2月21日,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表其主席弗雷德里克·肯普(Frederick Kempe)的署名文章《拜登的民主“拐点”对美国 and 盟国构成了历史性挑战》。文章表示,拜登在2021线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三次使用了“拐点”一词。作者认为,拜登政府将需要对其亚洲和欧洲盟友采取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创造性、集约化和合作性的互让方式,以推动共同事业,但团结盟友可能变得十分困难。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美国的任何政策都需要考虑到中国因素,因为中国是大多数美国主要伙伴的重要贸易伙伴;二、由于特朗普无罪开释后在共和党内部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其“美国优先”政策依旧受欢迎,所以欧洲对美国伙伴关系可靠性的疑虑将持续一段时间;三、美国及其欧洲伙伴必须先努力解决尚未解决的各种争端,如空客与波音的贸易争端、美德在“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上的纷争,避免再次破坏破镜重圆的双边关系;四、由于拜登政府不愿意进行新的贸易谈判,以及缺乏民主或共和党对协议的支持,使得美国与中国竞争束手束脚。作者称,历史拐点可以朝着正面或负面的方向转变,

因此，美国及其全球伙伴需要做出努力，应对这一决定性时刻。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inflection-points/bidens-inflection-point-for-democracies-poses-historic-challenge-for-the-us-and-allies/>

撰稿人：杨舒涵

## 2、皇研所刊文分析美国重返国际舞台后的困境

2月23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发表美国与美洲项目主任莱斯利·温佳姆里（Leslie Vinjamuri）的署名文章《美国回来了，但是世界已经改变了》。文章称，拜登政府上台后，为恢复国际地位采取了众多措施，比如重返《巴黎协定》、世卫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结束对几个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承诺为“COVAX”提供支持等。但美国重返国际舞台后面面对的世界与之前已大为不同：欧洲人对于美国的重返存在意见分歧，认为美国不太可能迅速恢复多边主义；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下降，中国多个层面上都在发展，世界也在前进；同时，美国新政府继续受到国内现实的束缚。如今美国面临最大的外交政策困境在于：一方面，面对价值观遭受的挫败，美国需要将此问题摆在外交政策的首位；另一方面，与中俄合作寻找可持续和平方案、寻求在气候变化和军备控制等方面进行合作又十分重要。拜登提出的新世界愿景——对内恢复美国的民主，对外防止威权价值观的侵蚀——比奥巴马时期的愿景更具意识形态化，

在全球范围内嵌入价值是一项长期任务，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务实的态度。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2/america-back-world-has-changed>

撰稿人：杨舒涵

### 3、《国家利益》：拜登应优先考虑朝鲜政策

2月23日，《国家利益》发表《半岛报告》创始人加布里埃拉·贝尔纳尔（Gabriela Bernal）的文章《为什么拜登在上任前100天应优先考虑朝鲜政策》。文章称，特朗普与金正恩的谈判并没有缓和双边关系和实现朝鲜无核化的目标，朝鲜反倒变本加厉，声称继续发展核武。美国应把注意力从中国转回朝鲜，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可能是决定东亚趋于稳定还是接近战争的决定因素。拜登政府设立了印太协调员职位以更好解决东亚问题，但其需注意不应让中国问题盖过对朝鲜政策的关注。文章指出，中国不是值得总统充分关注的唯一东亚国家，朝鲜同样重要。对朝态度太紧或太松都不会达到理想效果，拜登应首先尝试恢复两国工作层面的会面。具体来说，美国可以在工作层面与朝鲜先进行会谈，最终上升到领导层面会谈，以此向朝鲜表明美国愿意与其外交接触，建立信任基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驱使朝鲜为换取经济利益，援助和减轻制裁力度而逐步缩减核武器计划。作者指出，美朝双方现在仍有谈判空间，拜登政府应尽快修订并执行对朝政策，否则可能会危及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why-biden-must-prioritize-north-korea-policy-his-first-100-days-178719>

撰稿人：蒋宗焯

#### 4、《国会山报》刊文分析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2月24日，《国会山报》刊登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安德斯·阿斯隆德（Anders Aslund）的评论文章《如何评估对俄罗斯的制裁》。文章称，自2012年以来，俄罗斯成为西方国家的首选制裁对象。目前，仅美国一国对俄实施的制裁方案就高达15项之多。文章指出，制裁应通过威慑、惩罚来扭转被制裁国的不良行为，从而达到制裁的最大效能。制裁的针对性越强、范围越具体且参与的国家越多，制裁的效果就越好。为此，拜登政府做出了明智选择，要对这些制裁进行重新评估。文章表示，冷战之后，美国对俄罗斯的第一项制裁是2012年的《谢尔盖·马格尼茨基法治问责法》（the Sergei Magnitsky Rule of Law Accountability Act），主要针对侵犯人权或贪污受贿的俄罗斯官员。随后，《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正式生效，制裁对象为腐败、暴政的高级官员和大亨，适用范围扩大到全球。此外，美国另外两大对俄制裁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有关，其中，2014年7月的制裁，除了制裁一些俄罗斯具体公司实体外，还瞄准了金融、石油技术和国防技术部门。金融制裁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迫使俄罗斯偿还其外国信贷。201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主要是制裁与克里姆

林宫有关系的寡头。此外，2018年美国还对俄罗斯的网络犯罪、选举干扰和化学武器使用实施了制裁。文章建议，美国当前主要关心的三个问题应该是恢复与欧盟的协调、大幅改善执法，并通过威胁实施更多制裁来迫使俄罗斯离开乌克兰东部。同时，美国应就纳瓦尔尼事件对俄实施个人制裁。

<https://thehill.com/opinion/national-security/540113-how-to-rethink-russia-sanctions?rl=1>

撰稿人：刘宇宁

## 5、《外交学人》刊文分析美中在非洲的合作领域

2月23日，《外交学人》网站刊登了剑桥大学非洲研究哲学硕士候选人R·麦克斯韦·伯恩（R. Maxwell Bone）以及该校发展研究哲学硕士候选人费迪南多·奇诺托（Ferdinando Cinotto）合撰的文章《美中可以在非洲合作吗？》。文章称，尽管拜登政府继续将中国视作竞争对手，但美中双方均表示愿意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时展开合作。非洲既为美中两国利益合作与竞争的重要区域，且双方在非洲的合作已有先例可循。然而，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相关合作将比过去更具挑战性。为此需要明确美中当前可在非洲展开合作的领域。首先，在安全领域，亚丁湾联合行动展现出美中共同应对非洲海上安全威胁的潜力，未来可探索开展在几内亚湾的联合行动。此外，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多边安全层面，美中均在资金供给、战术行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可能成为两国之间加强安全与政治

合作的场所；其次，在经济领域，既有的美中“零和博弈”观点不符合双方在非洲的发展现实。两国在非洲不仅具有较强互补性，甚至能够实现与第三方的互利共赢。一方面，美中对非开展贸易与投资的国别、行业和特点存在差异，注重“软”基础设施、人力和社会资本的美国模式同注重建筑和制造业等“硬”基础设施的中国模式具有互补性。非洲国家则可通过此类多样化的投资来源获取发展利益。另一方面，在美中非三边合作领域，美中均支持非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且三边合作有助于推动非洲反腐败斗争；最后，在公共卫生领域，美中具有联合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成功先例，未来两国可寻求在向非洲联合供给疫苗方面再次合作。此举符合两国各自国家利益，也有助于应对非洲公共卫生挑战。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2/can-the-us-and-china-cooperate-in-africa/>

撰稿人：王乐瞳

## 6、《国家利益》刊文分析乔治·舒尔茨对当今美国外交的意义

2月24日，《国家利益》发表了美国前职业外交官厄尔·安东尼·韦恩(Earl Anthony Wayne)的评论文章《乔治·舒尔茨的持久智慧可指导当今外交》。文章称，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是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国务卿之一，曾担任四届内阁部长。在临近百岁生日之际，舒尔茨曾写过两篇重要的文章，强调“信任”的重要。曾与舒尔茨共事多年的

作者认为，舒尔茨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的成就表明，与伙伴国家建立基于信任的关系，与竞争对手实现基于信任的理解对实现美国的目标非常关键。为服务于美国利益，培育国家间的信任值得付出耐心与决心。此外，舒尔茨还特别重视加强对职业外交官的培训。文章指出，迄今为止，以布林肯为首的拜登政府外交政策团队已经体现出了对舒尔茨精神的继承，充分吸收舒尔茨的外交智慧将有助于美国在世界上实现“重建更好的未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george-shultz%E2%80%99s-enduring-wisdom-can-guide-diplomacy-today-178752>

撰稿人：刘宇宁

## 7、《报业辛迪加》：政策制定者应当考虑疫苗接种计划的三个假设

2月23日，《报业辛迪加》发表马来西亚公共卫生专家河昆村（Swee Kheng Khor）的评论文章《2021年的三个疫苗假设》。文章称，随着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在全球推广，政策制定者需要将三个现实假设纳入其防疫政策：不可避免的延迟，加剧的不平等、以及疫苗采购竞争可能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代理。文章指出，疫苗计划的延迟源于有限的供应链产能，而通过技术转让进行产能扩张则涉及到法律、监管措施和技术障碍，同时各国政府面临巨大的后勤挑战，难以提供全天候的疫苗接种设施以及适当的冷链支持。此外，各国采购疫苗剂量的差异将加剧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不平

等，发达国家可以比发展中国家更早实现广泛的疫苗接种覆盖和经济复苏，而各国内部的少数族裔、移民和穷人会被进一步边缘化。最后，地缘政治已经影响到公共采购进程，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禁止华为进入其 5G 网络的背景下，美中可能会进入疫苗领域的“军备竞赛”，以期获得科学声望、标准制定权、软实力和经济回报。文章建议，各国应当加强合作，利用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等国际机制联合起来进行集中采购。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ree-covid19-vaccine-predictions-for-2021-by-swhee-kheng-khor-1-2021-01>

撰稿人：凌邦皓

## 8、《外交事务》：日本已成为亚洲自由秩序新领袖

2月24日，《外交事务》发表了自由作家车畅（Chang Che）的评论文章《日本是亚洲自由秩序的新领袖》。文章称，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的新兴民族主义政治家增强了日本的自卫能力，以牺牲国家曾经强大的官僚机构为代价，加强了政府的行政部门，而且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过去四年，美国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抛弃其盟友并屈服于民粹主义，而日本通过加深与邻国关系，扩大多边倡议，并在贸易和数字治理等问题上制定区域议程，已成为印太地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沉默领导者。文章指出，在经贸领域，日本倡导成立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建立关于贸易、知识产权和数据治理的新规则，



并通过向印太地区国家提供与中国相媲美的经济援助，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形象。相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的基础设施计划优先考虑透明度、环境可持续性和问责制。在数字治理领域，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描绘了一个数据自由、安全跨境流动的未来愿景，提出了“可信赖的数据自由流动”概念，其目的是将自由价值观应用于新领域。在安全领域，日本提出了以法治、航行自由和自由企业为准则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文章建议，华盛顿必须首先努力减少与东京的摩擦，迅速而友好地续签日美驻军协议。此外，拜登还应寻求加入 CPTPP，增强日本和美国塑造亚洲经济规范和标准的能力。最后，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替代方案。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24/japan-new-leader-asias-liberal-order>

撰稿人：凌邦皓

## 9、《东亚论坛》网站刊文分析英国脱欧后的贸易战略

2月24日，《东亚论坛》网站刊登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肯·海登（Ken Heydon）的文章《英国脱欧后的贸易战略需要与中国接触》。文章称，英国脱欧后持续向“印太”倾斜，例如同澳大利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的签署也是英国加入 CPTPP 的重要一步。加入 CPTPP 符合英国首相约翰逊为抗衡中国而提出的“D10 民主集团”主张

（七国集团加澳大利亚、印度、韩国），也能够向未加入 CPTPP、且在华为 5G 网络和香港问题上与英国存在争端的中国释放相关信号。此外，CPTPP 的原产地规则还能帮助英国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扩展现有供应链。但文章同样指出，英国脱欧后在贸易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其与欧洲贸易联系的重要性正不断凸显。因为英国签署新自贸协定所带来的贸易收益远不及其与欧盟国家从单一市场降级为英-欧自贸协定后所造成的损失，还将面对 CPTPP 等各项新自贸协定所设定的更为复杂的监管。此外，由于贸易量与合作伙伴的规模和邻近程度有关，英国签署排斥中国的贸易协定并不能否定中国作为亚洲最重要的经济力量的作用。文章认为，英国应回归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的中心问题，重视 WTO 电子商务谈判。该谈判具有双重重要性：首先，其议题因疫情的数字化效应而日益凸显；其次，该谈判具有“多边”倡议属性，可推动包括中美在内的大国展开谈判，且成果有助于中国“改善国内治理”。英国的积极参与能够为中国、美国和欧盟在 WTO 架设沟通桥梁，其对英国的贡献将远大于试图排斥中国的举措。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1/02/24/post-brexit-uk-trade-strategy-needs-to-engage-china/>

撰稿人：王乐瞳

## 10、《报业辛迪加》刊文分析非洲的数字化发展

2月22日,《报业辛迪加》发表非洲联盟经济事务员维克多·哈里森(Victor Harison)和经合组织发展中心主任马里奥·佩齐尼(Mario Pezzini)联合撰写的文章《非洲所需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文章称,在非洲超大规模创造就业机会需要为非数字化经济带来数字化解决方案。但是,非洲创造就业的挑战巨大,同时目前的创业资源和全球数字革命所创造的机会不足以推动《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所设想的经济转型。在非洲创造就业机会需要依靠数字创新在整个经济中的传播。文章提出四项指导原则,以帮助政府调整和加强数字化战略。第一,非洲网络基础设施较差,公民网络享有率和费用承担能力低,政府必须促进数字创新面向每个人进行传播,而非仅仅是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口。第二,提升非洲劳动力素质以适应数字转型。同时,面对网络平台,建立坚实的监管框架和社会保护计划。第三,政府应助力初创和中小企业采用最有效的数字工具进行竞争和创新,以提高非洲公司数字化程度,创造更多机会。第四,政府应在数字税收、数据安全、隐私标准、跨境数据流和互操作性等领域开展超国家合作,从而将非洲大陆的数字化经济纳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同时,推进个人数据保护立法,通过关于网络犯罪的实体法。面对因新冠病毒危机扰乱的全​​球经济,非洲领导人应专注于实施《非洲数字转型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frica-digital-transformation-strategy-four-principles-by-victor-harison-and-mario-pezzini-2-2021-02>

撰稿人：蒋宗焯

撰稿人：凌邦皓、杨舒涵、刘宇宁、蒋宗焯、王乐瞳

审稿人：贺刚、肖方昕